

许道明 著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复旦博学

博
學



文学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许道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1
(复旦博学·文学史系列)
ISBN 7-309-03417-1

I. 中… II. 许… III. 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
IV. I20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560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8.75 插页 2

字数 485 千

版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依照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本色脉络，描述了六十年的历史过程，将其滥觞与建立阶段归为理性时期，深入与发展阶段称作综合时期，抗战以后至建国前夕为重塑时期，建国后至新时期开始则为“一体化”时期。除对重要批评家及其论著均予以相当全面的论评之外，还以批评家为主要集束点，阐释了各个时期的批评样貌和特征。全书材料丰富，观点稳健，论述平实，尊重学术既成，且颇多新识卓见，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十分切合教学实践，因此，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唯一专用教材，是各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及自学者教学用书的首选之作。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导	8
第二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滥觞	13
第一节 《新青年》批评家	13
第二节 胡适	18
第三节 周作人	25
第三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建立(一)	36
第一节 人生写实派批评家	36
第二节 沈雁冰	42
第三节 郑振铎	49
第四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建立(二)	56
第一节 自我表现派批评家	56
第二节 郭沫若	61
第三节 成仿吾	67
第四节 郁达夫	75
第五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深入(一)	86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批评家	86
第二节 闻一多	91
第三节 梁实秋	96
第六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深入(二)	105
第一节 革命文学批评家	105
第二节 蒋光慈	109
第三节 钱杏邨	113
第七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一)	122
第一节 左翼批评家	122
第二节 冯雪峰(一)	127

第三节	瞿秋白·····	134
第四节	鲁迅·····	140
第五节	茅盾(一)·····	146
第六节	郑伯奇·····	154
第七节	洪深·····	158
第八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二)·····	168
第一节	“京派”批评家·····	168
第二节	朱光潜·····	175
第三节	沈从文·····	182
第四节	李健吾·····	189
第五节	梁宗岱·····	196
第六节	李长之·····	200
第九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三)·····	208
第一节	朱自清及其他批评家·····	208
第二节	朱自清·····	213
第三节	《现代》批评家·····	222
第四节	李何林·····	227
第五节	苏雪林·····	231
第十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塑(一)·····	240
第一节	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艺思想论争·····	240
第二节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246
第三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52
第十一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塑(二)·····	258
第一节	解放区批评家·····	258
第二节	周扬(一)·····	263
第三节	何其芳·····	271
第十二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塑(三)·····	278
第一节	非解放区批评家·····	278
第二节	胡风(一)·····	284
第三节	李广田·····	293
第四节	袁可嘉和唐湜·····	299
第五节	邵荃麟·····	307

第十三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体化”(一)·····	315
第一节	中华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315
第二节	批评的陷落·····	319
第三节	批评“一体化”的确立·····	326
第十四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体化”(二)·····	333
第一节	走进新中国的批评家·····	333
第二节	胡风(二)·····	339
第三节	冯雪峰(二)·····	346
第十五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体化”(三)·····	356
第一节	“中心”批评家·····	356
第二节	周扬(二)·····	363
第三节	茅盾(二)·····	370
第四节	邵荃麟、何其芳和张光年·····	375
第五节	以群及其他·····	383
第十六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体化”(四)·····	392
第一节	非主流派批评家·····	392
第二节	秦兆阳和周勃·····	399
第三节	巴人和王淑明·····	405
第四节	《文艺报》异端·····	410
第五节	钱谷融及其他·····	419
第十七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体化”(五)·····	426
第一节	“工具论”批评的恶性发展·····	426
第二节	姚文元·····	432
第三节	“文艺宪法”与“革命大批判”·····	437
第十八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终结·····	443

导 论

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在上世纪初进入向现代转型的过程,表现出竭力摆脱固有传统的羁绊、向世界寻求共同话语的巨大热情。像对待现代中国一般文化一样,有人已经或企图用“断裂”、“裂变”之类来描述现代批评同传统批评之大异其趣。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神往“五四”前后中国文学批评扫荡固有传统的淋漓之气,以及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文化的渴望。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巨人傲视以往和向往新锐的神情往往动人心魄。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仅仅演出了它的序幕,它的转型过程并不因为已经跨入了21世纪而完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气象万千,非常有意思的是,来自异域它邦各色名目的“主义”犹如过江之鲫,颇有些“五四”时期的景象。这些“主义”大半在以往的历史时期倒是先后显过身手的,不过此番已具备整体的性状。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文学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语言学与风格批评、有机形式主义批评、神话批评,以及新的哲学批评——在中国或继续安营扎寨,或全线登陆。比如本文、肌质、结构、功能、张力、反讽、原型、“细读”……这些形式概念范畴在今天中国的批评界叠床架屋地出现,获得了大批稍为年轻的批评家的同情和迷恋。当然,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许多节目,在他们依然是主要的参照,是树立自觉认识的基地,也是超越传统的对象。

过分夸大当代批评撷拾西方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成绩,并不恰当。人们看够了“雁过长空”,然而,当代批评对于现代批评的某种反拨和补苴的意义,也是无法漠视的。尤其某些相对成熟的批评实践,现代批评之于它们,并非是灰色的记忆,整合的创造力量使它们的表面叙述氤氲着芳烈的摩登气息,而骨子里却依旧潜隐着中国人最为习惯的对于文学整体性的把握,一如在勃发形式研究兴趣的同时,大多又关注着和内容的联系。这些将有利

于人们对当代批评的体认,也有利于对现代批评的思考和描述。它们至少告诉人们:漠视西方学术文化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所发生的深巨影响,固然是盲人瞎说,而轻视固有传统的力量,以及那种深刻得多的民族文化心理所凝集的潜能,同样是痴人说梦。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胎动于振荡的近代社会,虽说它和近代文学批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倘若没有近代文化既成课题,倘若没有它的那层苦涩和沉重,也就绝对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锐利锋芒和风发的意气。从器物,而制度,而思想,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者向西方学习的路子,自然一程不如一程,不过,终于带着深重的教训把问题的症结推到了历史的前沿。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包括文学批评在内,正是在近代社会最薄弱最显痛苦的终点开始其生命史的。鲁迅用他的艺术创造揭示过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改造国民性表达了他的伟大怀抱。“开启民智”,拥抱着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背景,正是那个时代的旗帜,它作为根本性的任务成为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发脚的篇章。《新青年》同仁们,那批站在历史前列并开辟了中国文化新纪元的优秀知识者,他们在最初阶段的努力毫无例外是以此为中心课题的。在文学批评领域,关于白话语体文的倡导和“人的文学”观念的张扬,处处显示着中西文化的对比,既光大了近代曾有的,更是提供了近代所无的,使批评获得了合理的现代性。西欧 15、16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俨然是中国现代第一期批评家的理想,他们的劬劳为着批评的解放,直然也是人的解放,生动体现了批评对人的自由精神、创造力量的确信和呼唤。

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从表面看,“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家最初的理论兴趣集中在人的思想观念问题上,相当深刻地接受了近代变革运动的历史教训,并且还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化反封建的切入口。但他们无法漠视日趋凋敝的社会现实,也最终无法摆脱传统中国知识者的文化心理规范。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昏暗,并没有影响西方的人文主义者执著追求和呼号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活跃在上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者在热衷宣扬西方个性主义学说的同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忘情或超然于社会现实。倘若西方人文主义者显示的是某种探究的批评心态,那么,中国现代批评家们难以改变自己作为中国知识者的立场,他们倾向于拥有某种关怀的批评心态。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那种数千年来为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起来的实用理性精神,使他们习惯浸润于对国事民瘼的关怀和参与社会政治的热情之中。“五四”文学批评实际上最终没有给自身提供独立自主

的品格,而很快因现实社会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的表达着群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的意志和愿望。尽管现代中国始终存在着某些可以归属于自由主义、以标榜个性主义批评的派别,但骨子里却潜藏着不少对政治的关切,表现为批评对现实社会需要的特殊选择。当时的陈独秀便有句名言:“你们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们”。^①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是根本性的特点,它既出诸对传统的反叛而呈示出现代的体貌,同时也没有离开对于传统这一活的存在尊重和依赖。作为一种本由西方文化催生的中国新型批评,它曾经对西方古典主义批评有相当的心仪,也表现出关注西方浪漫主义之后批评新潮的宽阔视野。不过,历史已经昭示,外来的任何批评观念和范式都程度不等地经过了中国的过滤和变形。现代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的联系突出地表现在它对19世纪现实主义批评的摭拾,以至于最后服膺马克思主义批评,这几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对中国现代批评的决定性意义,恐怕只能用笛卡儿唯理论、洛克经验论、莱布尼茨唯心论对于法、英、德三国近代批评的意义来比仿。需要强调的在,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其它部门的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所含茹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对现代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巨。相对而言,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那些关于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接受和实践。

对于拥有深厚的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是他们最感兴味的了。重视真理的实用性和现实性,曾经使“五四”时期的批评家心折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但是不久他们中的大多数先后转入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对世界未来图式的预言,同它的创始人对客观规律性的渴求相适应,而对于客观规律的膜拜,恰恰也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所强调的内容。最先以沈雁冰为代表的“写实派”批评,最值得重视,它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实际的结合上开拓了自己光荣的道路,随后经由苏联和日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介,并且还借助于俄国民主义革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理论的漫漶,渐次登上了中国现代批评的主流地位。

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实用性异常强烈的批评,“经世致用”的观念决定了它并不依赖批评的纯粹性,因而也匮乏类似西方那样的专门批评

家。在中国,不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们的第一等身份是职业革命家,因此,他们普遍将文学批评看成是革命实践的一个部门,看成是革命实践的工具。即便那些不是那么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他们中间不乏专门学者,但从他们文学思想的根柢看,同样散发着实用主义的气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本意与实用相去甚远,但它们一到中国批评家的嘴边便生出相当实在的意味。逃避现实不仅是他们的初衷,而且还是他们的基本人生态度,不过是借着批评把自己装扮成“看客”来保护自己罢了。他们短少积极的干预精神,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逐实用论,大抵是一批消极的软弱的实用论者。大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用性,具体显示为批评和读者的联系,它首先是一种为着读者的批评,其次才是为着作者的。“批评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布……发扬和净化他的大多数读者的口味的工具”^②。说这句话的是俄国民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普遍拥戴的人物,而他的意见并不太悖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用心。

实用批评的发达,诗文论、诗词话的多至恒河沙数,本是中国传统批评的突出现象;在现代,批评家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依然保持着深浓的兴趣。这一历史时期的批评,当然包括有属于思想史的内容,但似乎更和同时期具体的创作实践关系密切,甚至主要是以创作实践的需要为前提的。许多理论课题在西方具有独立发展的前途,而在中国基本上被强调为从属于现实文学运动的应用性。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当代精神甚至驱使部分批评家力图通过文学批评促进实际的革命运动。文学批评是思想斗争的武器之一,是它的既极端又合逻辑的发展,从最高形态上概括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动机和功能。一般地说,作家作品批评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社会环境的精神趋向和现实要求全面覆盖了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品评,也简化了批评家复杂的批评心态。与此同时,作家作品批评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问题思考,普遍地用文学的社会性来排斥文学的艺术性,用文学所属的一般意识形态本质来代替和消融文学的特殊本质。鲜明而逼仄的价值观念召唤批评以鉴别和推断文学的社会功用为自身的切入点,甚至是全部思索的终点。就作品批评,表面上对内容与形式有所分别,底里却多尊奉内容一元化,形式仅仅处于从属的地位,于是也衍生了批评标准上的不适当的提法。就作家批评,世界观对文学观的全面替代,作家的社会思想立场,作家对实际社会革命服务的直接性,成为主要的判断依据。作家作品批评在现

代中国的这种命运有它值得夸耀的地方，它从批评的一个职能方面突破了历史的格局，然而，它同时也牺牲了批评本性的丰富，造成了与世界文学批评表面的共时而内容却相当特殊，极度发展了中国文学批评自先秦以来的实用传统。

为着强化文学与生活内容的同步关联，特别重视文学与社会的比照，几成现代中国批评家们与生俱来的法门。他们的作家作品批评一般表现为并不纠缠于阐述创作主体的特殊性，对作品的结构也少却相应的热情。他们最初从西方找着了丹纳、斯达尔夫人、圣伯甫、朗松、勃兰兑斯等等援手，而后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的意见中汲取灵感和方法。普列汉诺夫所言的，“历史和它的社会制度向我们说明了它的文学”^③，大体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命题。它极大地满足了文学批评对社会现实干预的渴望，从而焕发出芳烈的当代精神。这是一种基本上属于还原的批评类型，以生活的真实性规范艺术的真实性，旨在解决属于文学现象的社会历史因果关系，也即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一种“客观的批评”，历史必然性的立场，拥有最集中的渗透力，稀释或删削了关于艺术内部各类纷争。普列汉诺夫同时还补充，这也是一种“政论式”的批评，它不粘着于文学一隅，而对环绕文学现象的社会思潮表现出锐利的敏感，对它的起伏消长有极大的审度兴趣。这种批评类型大抵可归属于注重文学外部规律之一路，它发育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它们的影响范围及其力度，用任何方式表达都不会太过。由它也生成了现代中国批评的新成分，某些职业革命家，甚至某些领袖人物也在文学批评领域拥有显著的地位，他们那些从时代的哲学和社会思考高度提出的看法，充分激活了现代社会还原批评的活力，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局面。

中国现代批评的发生，本是为应和 20 世纪世界文学多元发展的潮流，力图打破相对封闭的中国传统批评的，但是，因着时代的原因，更是因着批评家自身的心智结构和实践态度，终于展示出越来越纯化的过程。传统文学批评和外来文学批评的营养在实用理性的深层整合下，得到了全面的抉择和演化。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它们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深刻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体貌，同其它意识形态部门一样，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然而，对于拥有静止而大一统文化规范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来说，他们似乎已习惯于理论的巨大包容性，而历史突出的课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一体化理论的追求，用抽象的概念来

笼盖文学的具体规定。虽说在现代中国,批评与创作始终胶着一体,但当批评为自己设置了一套规范性的概念体系,并以此作为创作实践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评价尺度时,批评家享有自己的崇高和圣洁,同时却又将自己推入了一个自身封闭的怪圈之内,从而失却了永不满足的创作探索精神。不能怀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中已经或将要显示的生命力,然而这种“不能怀疑”呼唤着科学和理性。六十多年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也出现过偏向,即当我们正确地指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时候,较少对文学的反映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反映做深入细致的分别。这种偏向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准确的把握,仅仅满足于应用性的论证和机械的维护立场,缺少将它不断丰富、发展的热情。随建国后文艺思想“一体化”的推行,这种偏向事实上已膨胀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文学批评客观地成为思想和政治斗争的附庸,甚至发展为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武器库。凡此,都严重损伤了科学理论的实践性,内在地与批评的实践目的性相分离。

六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历史以反思近代文学批评课题并突破其固有传统格局开始其生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民族文化心理背景的巨大力量又赋予现代批评以特殊的个性。由全面接纳西方批评学说到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选择,最后统一于政治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大体存在过四个时期:理性时期、综合时期、重塑时期和“一体化”时期。四个时期的起讫与现代史并不同步,也不完全相类于一般现代文学历史的分划,明显有其特殊的标志。

理性时期(1917—1925)。这是一个突破近代文学批评,深刻改变中国传统本体批评的时期,全面向西方洞开门户,追求与世界共同的批评话语。强调理性、注重启蒙是其主要标志,世界现实主义批评理论开始扎实地落下根基,但西方其它批评流派的阐介也相当广泛。本时期无像样的宏观批评,而大量微观批评在具体性状上已从传统的形式中分离出来。《新青年》同仁的发难,继之而起的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人生写实派批评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我表现派批评,最重要也最有影响。

综合时期(1925—1937)。这是一个由全面开放渐次向着有重点地选择并予以综合的时期。它的第一阶段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和闻一多、梁实秋诸氏新人文主义批评为标志。它的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深入,直接发育形成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三大批评板块:左翼批评、“京派”批评,以及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

级斗争的学说开始全面清理现代批评,并且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理性时期的视界开始收缩,借着苏联文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遗产的阐发,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批评先后得到中国批评界的重视。本时期已有相当出色的宏观批评,新人气息浓烈,不过,重外引而轻内举,重共性揭示而轻个性分析,已为普遍的倾向。

重塑时期(1937—1949)。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密切配合实际社会革命的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学问题的看法,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前提的规格全面整合了自“五四”以来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大众化、民族化、现实主义三大主题,注重社会演绎的还原批评达到了巅峰,部分还溢出了文学批评的范围。《讲话》对不同政治地区的批评家群体的实践,或前或后、程度不等地发挥着影响,以至最终步上权威地位。当然,这个时期还存在不同的思想,《讲话》政治—文学体系还接受着多方面的考验,其中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现实主义和以沈从文、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最为突出。

“一体化”时期(1949—1979)。这是一个以政策推行政治—文学批评的时期。新中国建立前夕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其起点,对文艺思想“一体化”的标举,铸下了现代文学批评背弃“五四”人学传统的基础石,并热衷于文学“工具论”的张扬。虽然某些纠偏的努力始终存在,时起时伏,但就总体看,现代文学批评日渐迷失本性,以“附庸”或“前哨”的身份,全面服务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年浩劫”对历史既成的空前扫荡,一方面把正确的指诬为错误,另一方面又将本来未得到纠正的问题,从极“左”的方向加以利用和发展。现代文学批评在破坏文艺生产力的同时,也将自身推向毁灭的边缘。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是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认真总结了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清算了极“左”文艺路线,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也标志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终结。

注释

① 《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辛未艾译)中卷,第164、1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③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第一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一章 现代文学批评的先导

任何一种文学事实对文学整体来说,都只有“阶段”和“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新的文学事实,无法摆脱历史既成的条件。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发难,就文学批评一隅,既为近代批评的尾声,又是现代批评的开端。他们的全部努力基植于某种沉重的反思,启蒙主义是其根本课题。

近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潮的形成历经半个世纪,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产物。从最初龚自珍充满忧患和叛逆的诗文到梁启超“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的呼号,数千年所沉积的传统终于开始动摇了。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中国人将他们的眼光投向西方,发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于是,西方的异端邪说,由“夷狄”而“西儒”,由“野蛮”而“先生”,随器物—制度—观念,一步一叹地深入,近代启蒙主义也随之发展为拍岸排空的壮潮。这股潮流无论在文化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无论在地主阶级知识者内部还是在已经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阶级贰臣之间,基本的原动力都集中在变革救国上,因此很难说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是自觉的,它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它直接是救亡图存的工具。即便在甲午战争之后,中西文化似乎已有大冲撞的态势,并且还闪烁着“新民之道”的光辉,但是,维新派对自上而下改良的深情和革命派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壮怀,都出诸急切的实用思考,最终没有获致普通民众的自觉认同。对实际政治斗争的严重关切,使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在有限的范围内宣传着启蒙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之后的事实对于他们太多讽刺意味,在中国现代历史大门开启之时,他们大都惊慌失措,而在他们停滞驻足的地方,新的思想文化生力军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不过,近代沉重而苦涩的历史,它在给现代提供了必然性根据的同时,也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甚至还提供了现代的某些展示规格。一般的文化是如此,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别括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化,还揭橥了其中的新质。

例如有人指出,近代文学观念的新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变“实利所归,一人而已”的封建文学为“万姓为公”的国民文学;其二,破杂文学体系而建纯文学观念;其三,由“独抒性灵”说走向创作“自由论”。凡三者,“关系到接受对象、文学本体、创作主体三大方面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具有纲领性的意义”^①。这类看法显然有提升和夸张之嫌,不过,倒可以从当时前卫批评家的实践中寻得某些证据的。

需要强调的是近代文学批评所借助的援手,林林总总的西方文化学术思想在近代中国普遍忧患思变的气氛中,既发挥着它们在本土曾经显示过的反封建功能,又被中国的先进知识者夸张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尽管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在传统中国不乏市场,近代批评之于它,有沉痛的针砭却又无法超越。指出近代批评的反封建性质,而轻视它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实用理性传统,显然是不妥当的。实际上,近代批评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突出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正是这一极其重要的特征,才使近代批评成为传统批评和现代批评的桥梁。“五四”前夕,《新青年》批评家最初的意识焦点,恰巧在近代想改变而未曾得到改变的地方。此外,近代批评对文学“自由论”的吹胀,并没有深入到直逼创作主体的复杂丰富的心灵,主要局限在对于封建文学专制性的抨击上。当然也有例外,少数批评家对文学本体的探讨保有执著的兴趣,但在功用派批评家的巨大身影下,实在显得影影绰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不问政治社会立场如何,在文学批评的运思方式和突破封建道德文学的见解上却相当新颖,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接受,在程度上绝不亚于革命派批评家,于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营垒内唱出了资产阶级的文学新声。

面向世界的眼光和反对封建道德的目的,推助近代启蒙运动的开展,近代文学批评的时代性品格大抵也来自这一总的学术空气。不过,似乎并不能忽视近代批评是一种头脑伸向窗外而双脚还是扎在本土的批评。它有冲破传统的内容,同时也显示出始终不脱传统文化心理的特征。这一时代的批评家借着这种内在矛盾,相当艰苦地告别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昨天,并成为现代批评思想上和风格上的导师。

从近代走向现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推梁启超。就文学批评的专门范围而言,梁启超以西方学理为参照所从事的实践以及所倡导的思想,有力地刷新了中国传统的批评风气,而他已经涉及而最终没有深入的许多课题几乎大多成为现代批评的宝贵启导。他对文学语言通俗化的敏感,有来自

西方文化的启迪,但开启民智的总任务,使他的全部有关意见旨在打破艰深的古文和广大民众的阻隔,从而拓展和强化文学的宣传功能。他是新文体的理论家,更是新文体的实践家,他所倡导的“新民体”,标志了他承继和发展了自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来时代对文学的历史要求。尽管他的全部标榜没有最终逼视“白话文”,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及黄遵宪“吾手写吾口”,尽管他的主观用心主要不是为文学提供新内容,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没有料到,他的“新民体”风靡神州,激动了数代人的心灵并培育了他们更为豪迈的胸襟。从理论上说,也正是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关于文学工具的改革思想,作为壮实的启蒙因子,在他止步甚或有所后退的地方,“五四”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放送了第一羽春燕。

梁启超自称“余向不能诗”,但他善于论诗。他的身影不仅活跃在当时的“诗界革命”中,一部《饮冰室诗话》几乎就是诗界革命的理论阐扬和总结。他对传统古典诗词的鄙薄也许不乏偏激,而他从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出发张扬诗歌革新的关键在于追求诗的新理想、新意境,终究不失时代的价值。至于他的诗评兴趣相对集中在当代人的作品,不满足传统诗评“薄今厚古”的积习,实在也是一种新气象。凡此种种,从观念到实践,创立了同传统对立的范式,更是泽披现代,影响了“五四”时期新诗批评的兴趣热点及其标新立异的趋向。

婢作夫人,附庸蔚为大国者,是近代小说的贡献,也是中国文学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在小说批评领域梁启超直面世界潮流,表现了较之所有先驱者强烈得多的反叛精神。《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他的纲领性文字。他不仅令人惊诧地吹胀着小说的社会作用,竟至将“新”小说看成是“新民”的前提,而且对小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有一番独到的阐发。作为名重一时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思想家,他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魄力和心智,他创办《新小说》杂志,重视小说,论述小说,创作小说,还翻译域外小说,近代所谓的“政治小说”便始于他的笔下。此外,他对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的区分,以及有关小说“熏、浸、刺、提”等艺术感染力的揭示,很有价值,但终究缺乏独立的意义。总之,与其说他重视小说艺术品格,毋宁说为着谋求小说服务政治的有效性。梁启超的小说思想,也即他的文学思想,其中所包含的具体问题,不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震烁近代,而对现代政治—文学体系的确立,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引导意义。

在近代文学天幕上,有资格和梁启超交相辉映的是王国维。自然,王国

维并不像梁启超那样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终生拖着一条前清的小辫，不过他的那身长袍马褂内却包裹着一腔相当摩登的情怀。如果梁启超集中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显示了政治家型批评家的夺目光彩，那么，王国维则主要由在中西文化冲撞的背景下对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探寻而给后世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卓见，大体显示了学者型批评家的特立超拔。

梁启超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专注于它的社会作用，王国维几乎站在他的反面，他也极言文学，却阐扬其独立的作用。在他看来，“美术(文学)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人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当他谈到中国传统诗人“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②时，神情和语调确乎特别沉痛。由西方康德、叔本华一路近代美学家的启发和诱导，王国维建树起自己的文学本体论观念。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不再是他的发脚点，无意像梁启超那样用新的“文以载道”去置换旧的“文以载道”，而是标举文学“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本性；政治家的文学眼光不再为他所恭维，无意像梁启超那样执著于用政治道德为论衡文学的标准，而推崇重视人格判断的伦理学标准。王国维的这类批评理论当然同他的气质、禀性，以至于人生命运和生存智慧有关，就其根柢也自有偏颇在，阐述上也不乏可议之处。但是，他对于文学本体的重视有其独到的价值，在近代文学批评中，他对梁启超的理论无疑有着特别的补正作用。他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借着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烛照，尽管偏于文学本体一隅，却显示着一派深入而新颖的气象，从论点到方法，闪耀着有别于传统的灼人光芒。他对典型和意境的阐发，对中国小说戏剧中悲剧问题的判断，站在新的时代角度对文学批评中史官传统的弘扬，以及推动中西文学比较方法的采用，都是他对时代的贡献，其中大部深入并引发了近代批评的实践，作为一种潜在的分子也为现代文学批评始终无法忘怀。

从影响的深长看，王国维关于文学民族特性和中西文学融会的思想显得特别深刻。传统过久而趋于停滞的中国文学需要外力之刺激方能有新机，对此他有自觉的体认；而对于中西文化特征的比较，更是表率群伦。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剀切地指出：“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转于分类……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